



劉以鬯

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，長期從事編輯工作，曾任《香港文學》總編輯，現為香港作家聯會會長，著有小說《酒徒》、《寺內》、《打錯了》，評論集《端木蕻良論》、《看樹看林》等數十種。

我在四十年代  
上海的文學工作

主講：劉以鬯先生

整理：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

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、香港文學研究中心及大學圖書館於2005年6月18日至7月16日期間，聯合舉辦了一共六講的「中國現代文學講座系列」。本文依據劉以鬯先生2005年7月2日的講演《我在四十年代上海的文學工作》錄音整理而成，經劉先生審閱定稿。

各位愛好文學的朋友，今天的題目是：我在四十年代上海的文學工作。我在香港文壇工作超過了半個世紀，可是很少人知道四十年代我已經在上海從事文學工作了。那時我才二十多歲。題目說的「四十年代」，是指1941到1949年這段時間。

### 「孤島」淪陷 前赴重慶


1941年夏天，我剛從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，本來打算到美國唸碩士，那時到外國讀書是要申請的，我已經申請了，只欠那邊的回信便可以到外國去。可是，回信還沒到便爆發了太平洋戰爭，那是1941年12月8日，在美國是7日。戰爭爆發時我在上海。那時上海有個地方叫「公共租界」，另外一個叫「法租界」。上海四面都被日本人佔領了，但是住在租界裡的人仍可以自由地生活和寫文章，甚至發表具抗日意識的作品。因為上海周圍都是日本人佔領的地方，只有租界屬於自由區，所以大家把租界稱作「孤島」。

到了太平洋戰爭爆發，日本人的坦克車轟隆隆地開到租界裡來，上海這個「孤島」就陸沉了。那時我想，如果日本人一進來，我是不能留在上海生活的，這有兩個理由：第一，我是個年青人，不願意在日本人控制之下過日子；第二，當時有謠言說日本人要抽壯丁，那我就更加不願留在上海。大家試想一下，我們怎能被日本人抽去跟自己中國人打仗？於是我跟父母說我要到重慶去。那時我的年紀很輕，剛剛大學畢業，沒做過什麼事。我選擇重慶是有兩個理由的：第一，

那時候重慶是中國後方的首都；第二，我哥哥從美國回來後也跑到重慶去做事，如果我到了重慶，最低限度我還有哥哥在那邊，吃飯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的。父母親都覺得總不能讓我在日本人控制的地區過日子。於是我父親給了我四封信，我要單獨一個人從上海經浙江、江西、湖南、廣西、貴州到重慶去，這些都是我從沒到過的地方。經過浙江的寧海，我拿一封信去找父親的朋友，他們便給我住的、吃的，然後想辦法，替我安排到另一個地方去找我爸爸第二封信的朋友，我就是這樣子跑到重慶。抗戰時期，我在重慶大概住了三年，曾在《國民公報》與《掃蕩報》工作，主要是編副刊。

### 重返上海 創辦「懷正」

到了1945年，抗戰勝利，我便跟老闆說：「我的父親去年在上海去世，只有我母親一人留在上海，所以我要回上海去。」起初老闆不許我走，但我堅持要回去照顧母親，不能讓她孤獨一人留在上海。這時候，報館剛好準備在南京和上海籌辦新的《和平日報》，老闆才答允我說：「兩星期後你到上海《和平日報》工作吧。」知道這個消息後，我很高興。我進了上海《和平日報》任主筆，負責編副刊。當時上海版的《和平日報》有兩個副刊，一個是專門刊登新文學作品的，一個是專門刊登舊文學作品的；新文學那個是我編的，舊文學那個則由易君左來編，他是一位很有名的作家。後來，我哥哥也從重慶去南京回到上海，母親告訴我們，爸爸死時留下了兩幢房子給我們，一幢是A

 城市文藝

座，一幢是B座，都是為我們兄弟倆蓋的，現在我們回來了，A座給我，B座給我哥哥。那時我還沒有結婚，我住在三樓，母親則住在三樓另一臥房。哥哥、嫂嫂和他們的孩子便住進B座。此外，母親還把父親留下來的一筆錢分作三份，一份她自己拿，一份給哥哥，一份給我。這樣，我不但一下子擁有這三層樓高的洋房，袋子裡還有不少錢。我從小愛好文學，在大學唸書的時候，也常常跑到外國書店去買書，我買過John Dos Passos的《U.S.A.》，也買了Leo Tolstoy的《War And Peace》、James Joyce的《Ulysses》。當時我就覺得為什麼外國人出版的書總是那麼漂亮，而且全都是精裝本。那時我很年青，於是想辦一家出版社，抱著兩個原則：第一是出好書，出我認為好的書；第二是出版社的資金全部由我一人負責。我住的那幢三層樓洋房，地下用作出版社的辦公室。我把這家出版社命名為「懷正文化社」，因為我們家的宗祠叫做「懷正堂」，我就用它作為出版社的名。

不知大家有沒有聽過「徐訏」這個名字？他這個「訏」字，很多人讀作「于」音，其實這個字應該唸作「許」音，但是很多讀者都把它唸成「于」字，為了遷就讀者，徐訏索性把筆名改成「徐于」，把「言」字去掉，「徐訏」變成「徐于」，這樣就再沒有人唸錯他的名字了。我在重慶編《掃蕩報》副刊的時候，曾連載過他的長篇小說《風蕭蕭》，深受讀者歡迎。徐訏從美國回來後，我告訴他我要辦一家出版社，便跟他說：「你現在回來，我第一本要出版的書就是你的

《風蕭蕭》。」他說「好」，便把書給了我出版，這是我辦的懷正文化社出版的第一本書。那時候，我很有一點雄心，年青嘛，袋子裡又有錢，認為要出書就一定要出厚書，出有份量的書。這本書後面有一個印，印著「懷正文化社」幾個字，這本書現在很難找得到。講座前，我跟許定銘先生午膳，他是專門收藏舊書的，他說我在上海出版的那些書，現在要找是十分困難的，他只能找到兩本。我今天藉這個機會，特地帶這些書來讓大家開開眼界，也讓大家知道四十年代有這麼一個年青人，自己搞出版社，還出版了一些好書。

### 離開上海 前往香港

當時上海的情況十分混亂，出現了金融風暴：早上買一包香煙要一萬塊錢，已經覺得很貴，可是到了中午再買，價錢升到一萬五千塊，下午再去，要兩萬塊，到了晚上，三萬塊一包。這說明了當時的日子簡直不能過，袋子裡的鈔票，等於沒用。你有錢的話，只有一個辦法，就是趕快拿去買黃金、買美鈔，結果使那些統治上海的官員下令不准人民購買外幣，也不准擁有黃金，如果有就屬違法。結果日子不能過了，我辦的出版社要面臨兩大困難：第一，國民黨和共產黨正在打仗，訂書無法寄到外地。第二，物價暴漲，書的售價永遠定不下來，那時候一本很薄的書，約一百多頁，大概要賣一百五十萬元，這個情況根本沒有辦法過日子。我辦的出版社也出了一些書，可是出了書也沒有用，反而白報紙可以換錢。在那種情況之

下，我想我只有到香港去。因為在國內，國民黨和共產黨打仗，出版的書根本不能發行，就算發行也收不回錢。於是想了想，認為到香港去的話，可以向海外發展，我的出版社到香港後也可以辦下去。當時實在沒有辦法，只有獨自坐飛機從上海到香港。

可是，來到香港後才發現，大部份的香港讀者對嚴肅文學沒有興趣。雖然國內也是這樣子，但是香港是一個商業社會，文學商業化的情況比國內更加嚴重。至於海外讀者方面，他們的水平比香港更低，我出版的書很少人會買。於是我有返回國內的念頭，可是上海正在打仗，共產黨的軍隊已經過了長江，上海變成另外一個地方了。1949年香港剛好有人要辦一份報紙，這個人我本來不認識他，他來找我是因為我在重慶編過兩家大報的副刊，而且都編得不錯，想請我編副刊。這樣子我有了工作，可以繼續留下來。後來，報內有位主筆寫了幾首舊體詩給我，要我在副刊內刊登。我從小喜歡新文學，不喜歡在副刊刊登舊體詩，我編的這個副刊有自己的作風，於是我拒絕了他的要求。他便到老闆面前說我的壞話，結果老闆叫老總給了我一封信，說請我做撰述委員，換句話說就是「炒魷魚」。我沒有薪水拿了，以後怎麼辦呢？回不了上海，又沒有工作。期間，我投稿到《星島晚報》，他們用了我的稿，而且很喜歡我每天寫的約兩千字的短篇小說，他們每兩三天就登一篇，這樣一來我每個月就有幾百塊稿費。從這個時候開始，我就在香港賣文為生。今天，我要講的是四十年代我在上海的文學工作，香港部份我只說

到這裡。

## 「懷正」叢書 作家群立

1945、46年，我創辦了一家出版社，出版了一些新文學作品。當時我們印的出版目錄是與眾不同的，是以書的方式來印的。為什麼我現在還有這個懷正文化社出版的目錄呢？因為離開上海的時候，我帶了一本來香港，現在也快要爛掉了。當時我還帶了一套懷正文化社的書來香港。1952年，新加坡《益世報》請我過去編副刊，於是我就跑到新加坡去了。我本來擁有一套「懷正」的書，因為不方便帶到新加坡去，於是交給我姓周的表哥。後來，表哥到台灣去居住，把我的書全部扔掉。因為在這些書當中，有些是左派作家的書，像田濤、姚雪垠那些都是左派的。他去台灣的時候發現這些書有問題，就全部扔掉了。我從新加坡回來，知道後非常懊惱。我在新加坡的時候，買到一兩本我當時在上海出的小說，後來我回到香港，常常到舊書檔找我在上海出版的書，偶爾也會找到一兩本。今天我帶來了幾本讓各位看看。包括熊佛西的《鐵花》，趙景深的《西洋文學近貌》、許欽文的《風箏》、戴望舒譯的《惡之花掇英》、田濤的《邊外》、劉盛亞的《水滸外傳》等。

剛才提到《風蕭蕭》的作者徐訏，那時候他住在我的出版社裡。後來有一個叫徐昌霖的作家，介紹了姚雪垠給我認識。我很喜歡姚雪垠的作品，因為他寫了一個短篇小說叫《差半車麥稈》，是抗戰時期最受人重視

的短篇小說。徐昌霖跟我說，姚雪垠從河南來到上海，要跟我見面。我那時每天上午在出版社上班，下午到上海的國際飯店喝咖啡，作家要來找我，就是到咖啡室去。徐昌霖就是帶姚雪垠到那個咖啡室去跟我見面。我跟姚雪垠說，我很喜歡你的《差半車麥稭》，也很喜歡你的作品，準備出你的文集。當時我問：「你的生活情況怎樣？」他老實跟我說，他連住的地方都有問題。於是我說：「沒有問題，徐訏也住在我的出版社裡。我可以在存放叢書的倉庫裡放一張床，一張寫字枱，你可以寫文章又可以有地方過夜，而且可以跟我出版社的職員一起用膳，生活就完全解決了。」我幫他出版《雪垠創作集》：《差半車麥稭》、《長夜》、《牛全德與紅蘿蔔》、《記盧鎔軒》。剛才我提過，「懷正」出版的第一本書就是徐訏的《風蕭蕭》。我以為出版新文學的書，是一定要賠本的，但令我感到很意外的是，這本書一

連賣了三版，並賺了一筆錢。後來我跟徐訏說，你的書我全部幫你出版。他那時見我還是個年青人，便說「好」，不過書的背面不可以寫「懷正文化社」，要寫「夜窗書屋」，這我也沒有所謂。這樣，徐訏的書便一下子把我出版社的經濟穩定下來。期間，我也出版了一些其他新文學的書，有些當然要賠本，不過因為最初賺了點錢，我自己也有點積蓄，辦公室又是自己的房子，賠了本也沒有什麼大問題。

今天，我還想跟各位談談我帶來的另一本書——李輝英的長篇小說《霧都》。出版這本書的時候，我年紀很輕，有很多幼稚的想法。我讀大學的時候，總是到外國書店去買書。外國出版的書都是精裝本，印得十分漂亮，我們中國出版的書老是這個樣子。於是，我打算出版一部長篇小說，便寫信給李輝英。抗戰時期，李輝英已經給我寫過稿，所以我認識他。他回信跟我說，他有一部長

篇小說，日本人已經翻譯做日文了，可是中國還沒有出版過這本書。於是我叫他寄來，替他出版。我拿到這個長篇小說之後，高興得不得了。我原本的想法很幼稚：外國人出書出得那麼漂亮，為什麼我們中國人不能？結果我花了很多錢，印了兩千本，全部都是精裝本。單是釘裝的費用，已經佔了成本很大部份。現在這一本是我在很困難的情況下買到的，



所以我把它包好，今天也不拆開了，就這樣給各位看看吧。當時我花了很多錢，出版了兩千本精裝本，我想中國人的出版社從來沒有這樣子做過。這是一個年青人幼稚的想法，但是這個幼稚的想法也有它的作用，就是說中國新文學的書，也曾經有出得那麼漂亮的。

四十年代的上海，幾乎整個文壇都被農村小說佔領著，但我不管，只要是好的文學作品，我就出版。由於姚雪垠認識的作家比較多，希望他介紹兩三本書給我。剛才提到熊佛西那本書《鐵花》就是他介紹給我的。後來我找到施蛰存，他是現代派的作家。當時我跟他住得很近，步行幾分鐘便到。我告訴他我要出版一套文藝叢書，希望他可以給我一本書出版，他便把《待旦錄》給我出版。書出版後我又跟他說：「你一定認識戴望舒！」，他說：「是的。」我又問他：「戴望舒的情況怎樣？能不能請他也給我一本書出版？」於是，施蛰存替我寫信給戴望舒，後來戴望舒就把他的《惡之華掇英》交給我出版。除了文藝叢書之外，我還出版一套懷正中篇小說叢書。那時候有一位叫作秦瘦鷗的作家，他寫了一本叫《危城記》的書，是一本銷量很好的書，他給我出版。後來我又找了姚蘇鳳，抗戰時期她曾經在《新民晚報》編副刊，也給她寫過稿，所以我請她給我一篇中篇小說。她給我《鑄夢傳奇》。這本書現在也買不到了，找也找不到，但我怎麼會有手上這一本呢？我剛才說過，我現在有懷正的書，都是一本一本想盡辦法找回來的，找得那麼辛苦，也只找到這幾本。我手

上這本書是我哥哥給我的，裡面有張紙寫著「續哥的」三個字。為什麼我哥哥會把這本書給我呢？原來他去巴西的時候，帶了幾本我出版的書，這是我不知道的。我帶來香港的那一套懷正叢書，卻給我表哥扔掉了。我哥哥去世後，他兒子只懂巴西文，於是把我哥哥的書都寄回來給我，我才發現原來還有這幾本書。這些書真的得來不易，由上海到香港，由香港到巴西，到我哥哥死後再從巴西寄回來給我，這些書真的很難找到了。每本我送給哥哥的書，我都寫了「續哥的」幾個字。

曾經有人問我，那個時候我二十幾歲，開始寫小說沒有？當時我在辦出版社，而且從小愛好文學，所以也寫了一部中篇小說《失去的愛情》，但我卻很不滿意這篇小說。因為今天講的都是史料，所以我也把它帶來了。這部書是四十年代在上海出版的，裡面也有一張紙，是我送給哥哥的書，如果不是他，我根本不會保存這本書。四十年代，這部書曾經改編成電影，在上海最大的戲院——大光明戲院上映。上海解放後，在這家戲院放映的第一部中國電影，就是我寫的《失去的愛情》。那時我已身在香港，未有機會看到這部電影。後來我在書攤買到兩本依據這套電影的劇照編成的連環圖，買到這兩本書，也就等於看到這部電影，我現在還保存著這兩本書。今天我就講到這裡。謝謝各位。